

被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评为“2007年度全行业优秀畅销品种”

总第四十五辑 2010.1

张晓晶 当经济学不再时髦

胡怀国 都是GDP惹的祸

柳红 脚踏实地的农发组

徐康宁 斯密的背影尚未远去

周业安 菜单的成本

易秋霖 为何大商场不能讨价还价？

郭艳茹 婆媳大战与社会转型

晏宗新 为什么广州亚运会门票贵过北京

陈宪 迪斯尼、《回头客》与消费能力

李俊慧 人类的坏记性——戏谈金融危机

巫继学 『企业王朝』只是一个传说？

赵人伟 解读科尔奈

高新军 金融危机下的惨淡美国民生

主编 金明善 特邀执行主编 詹小洪

经济学家茶座



山东人民出版社

《经济学家茶座》的理由

詹宇波

在所有社会学科当中，经济学也许是对行为人的理性要求最高的一门学科。如果说当年诸多社会学科从社会哲学当中分离出来的主要依据是根据研究领域，那么对于经济学而言，同时被分离出来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即在于其拥有最为坚实、可以贯之于始终的理论内核——理性经济人假定。这一假定不仅让所有经济学的分析看上去逻辑严密而一致，更成了经济学向其他社会学科领域拓展，推行所谓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多年以来，经济学家的努力大都集中于如何让这个经济学分析框架构建得更加精巧迷人。主修经济学的学生往往在第一堂课即被灌输这一此后在他（她）一生当中要被奉为主臬的原则，从而成为被理性严格改造的对象。然而，正所谓“成亦萧何，败亦萧何”，这个经济学的框架~~被设想得过于精巧~~，以至于诸如个人理性向集体理性的转变、理性的个人的学习过程~~在犯错过程中往往被简单地忽略~~，或者被搁置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理性的分析思路使得对行为结果的预期变得十分简洁洗练，可是对于提供在现实中达成这一结果~~的途径方面却收效甚微~~。

从已发生的历史事实来看，~~现实经济世界对理性经济人假定表达不满的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微观层面的个体失败和宏观层面的危机爆发~~。个体的失败无时无刻不在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发生着，不胜枚~~举~~数量有限，可是每一次的爆发都几乎能让整个世界或世~~界~~付出惨重的代价。当闪耀着理性光芒的经济学模型在给~~世界总是在一个预想不到的时刻将大家拉回现实的轨道，让人们反思之前的行为~~。这大概也是为什么旨在让大家了解“是什么”的经验研究在当前经济学界日益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在他的《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经济处方》中虚构了一个被事先告知了一整套“正式的”经济发展政策方案的火星人来到地球，却发现事实与这个方案根本不符的故事。这些“正式的”方案往往来自于同样“正式的”研究成果。如果大家承认是那些“正式的”物什让这个可怜的火星人感到困惑的话，我想我们就找到了阅读《经济学家茶座》的理由。

（作者系上海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



经济学家茶座

第 **45** 辑
2010.1

编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光远 王松奇

王东京 王振中

王瑞璞 冯兰瑞

刘 伟 刘方棫

刘国光 吴树青

汪丁丁 张卫国

杨瑞龙 林 岗

项启源 钟朋荣

洪远朋 洪银兴

胡培兆 赵 晓

顾海良 梁小民

黄少安 程恩富

蔡继明

主 编

金明善

特邀执行主编

詹小洪

项目负责人

董新兴

特邀执行主编助理

维亚龙

目 录

□ 卷首语

詹宇波 《经济学家茶座》的理由 / 001

□ 学问聊斋

张晓晶 当经济学不再时髦 / 004

胡怀国 都是GDP惹的祸 / 008

韩朝华 制度演变：路径依赖or路径创造？ / 013

谢作诗 经济问题与经济学问题 / 017

皮建才 经济学里的“思想陷阱” / 019

蔡银寅 从数据“依赖症”到经济学伪命题 / 023

□ 学界万象

柳 红 脚踏实地的农发组 / 028

徐康宁 斯密的背影尚未远去 / 036

朱 玲 “就汤下面”的智慧 / 041

张永山 经济学是甜的吗？ / 042

□ 国是我见

邹至庄 迎接一个外向型的中国 / 046

王五一 赌博为什么这么贵？ / 050

谢明干 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子怎么走？ / 056

徐昌生 企业的社会责任其实并不存在 / 058

陈 钊 碳是一场政治 / 064

□ 生活中的经济学

周业安 菜单的成本 / 066

易秋霖 为何大商场不能讨价还价？ / 069

郭艳茹 婆媳大战与社会转型 / 072

冯 伟 昂贵的优惠 / 074

赵红军 江湖的湖南土菜馆 / 076

杜凯 万宏 闯红灯与挤公交：目标依赖下的创新缺失 / 078

□ 经济随笔

晏宗新 为什么广州亚运会门票贵过北京奥运会？ / 083

史晋川 “彭宇案”与“丽莎案”

——经济学视角下的法律与道德 / 087

胡海鸥 白毛女与鲍西娅比较的思考 / 090

高明华 柯希嘉 有限责任无限精彩的一人公司 / 093

□ 经济评论

陈宪 迪斯尼、“回头客”与消费能力 / 098

李俊慧 人类的坏记性——戏谈金融危机 / 102

巫继学 “企业王朝”只是一个传说？ / 107

王宏淼 以金融四项基本原则的名义 / 111

蒲勇健 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的博弈思维 / 115

王永钦 为什么中国人特别讲“关系” / 121

□ 经济学人

赵人伟 解读科尔奈 / 125

徐秋慧 忆高鸿业先生二三事 / 135

□ 经济书评

那国毅 下一个社会怎样管理？ / 141

□ 经济史话

祝曙光 财政危机与法国大革命 / 144

□ 他山之石

高新军 金融危机下的惨淡美国民生 / 149

詹小洪 国际建筑市场上的韩国承包商 / 152

吴崇伯 印尼为何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 / 15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学家茶座(第45辑)

金明善主编.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0.3

ISBN978-7-209-05249-8

I. ①经… II. ①金… III. ①经济学—文集 IV. ①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第044547号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http://www.sd-book.com.cn>

编辑部电话: (0531) 82098012

Email: chazuo4901@126.com

发行部电话: (0531) 82098027

82098028

邮购电话: (0531) 82098021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2010年3月第1版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172毫米×232毫米 16开

10印张 160千字

邮发代号: 24-180

定价: 14.00元



学问聊斋

当经济学不再时髦

◇ 张晓晶

一、经济学的繁荣与萧条

经济学成为显学似乎很久了。但真的算起来,在中国恐怕也不过 30 来年的时间。这和改革开放的时间基本一致。这不是巧合。正是因为改革开放,中国才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正是因为改革开放,人们才可以公开地关心所谓利益的问题,甚至是一己私利。由此,从上到下,中国对于经济学(家)的关注开始超过以往任何时候。

然而,经济学的时兴也并不是没有曲折,就像很多当红的明星也会遭遇负面消息困扰一样,经济学在其红火的同时,也不断受到挑战。如果说经济有繁荣和萧条,那么经济学也一样,此一时彼一时。有一个时期,经济学被指缺少人文关怀,关于经济学(家)是否讲道德的问题争得不可开交。尽管至今也还没有定论,但通过争论大家基本明白了,光有经济增长与财富积累这样的总量概念,而不去关注到底是哪些人分享到了增长的好处,或者这样的分配到底有哪些不合理的地方,是远远不够的。人们将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对于人文关怀的漠视,甚至道德沦丧,都归咎到经济学(家)了。这是第一波挑战。这波挑战意味着,经济学的胸怀还应该更宽广一些,除了对于利益和财富的斤斤计较,还要有人文关怀,特别是对于底层百姓民生的关怀。

如果说经济学的第一波挑战基本上属于“修正主义”的阶段,那么第二波挑战就是革命性的了。次贷危机以至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让人们对于经济学的科学性甚至“合法性”产生了怀疑。这样一个对于危机无法预知并且对于危机还负有责任的经济学,怎么能够再体面地存在下去呢?连英国女王访问伦敦经济学院的时候都在质问:你们怎么不早告诉我们(危机)?这个时候,即便是一些领军的主流经济学家也都开始反思:经

济学尽管“看上去很美”，实际上却是问题多多，需要有根本性的变革了。

当然，发展了几百年的经济学不可能在这次危机中轰然倒下。经济学曾经历过很多的繁荣与萧条；经济周期往往伴随着经济理论的周期。历次大的经济危机总是会带来经济学本身的危机，同时也带来经济学的变革。从这个角度，认为危机会推动经济学的发展也不为过。

然而，即便主流经济学在经历了这次危机之后能够脱胎换骨，痛下决心革自己的命，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吗？我们的困惑在于：将经济学奉作解读世界的圣经，仅仅以经济学来剖析这个世界，能行得通吗？

二、唯经济学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经济学的时兴或唯经济学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原因在于我们现在还摆脱不了经济性的目标，特别是追求经济增长与财富积累的目标。然而，纵观历史，增长并不是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就有的，而只是工业革命以后才出现的。按凯恩斯的说法，从有史记载的最早时代——例如上溯到公元前2000年——到18世纪开始，生活在地球上的文明中心的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太大改变。研究现代增长理论的学者们也公认增长只是工业革命之后的事。那么，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又在追求什么？是不是增长目标之外的更多的精神价值呢？

大凡看到物欲横流，人们总会想到过去。看到今天的全球化、市场化以及世界范围内的GDP竞争，人们也一定会想起过去可能有的美好时代。无论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还是维吉尔的田园诗，都成为某种标志性的回忆。人们猜想那个时候尽管物质生活并不很丰裕，但精神生活很富足；越是物质匮乏的时代，人们的价值追求越可能丰富多彩。不过，这种物质生活与精神价值的分离，实际上只是一种想象。因为，追求精神价值的仍然是那些富足的贵族或奴隶主，而普通百姓还是为柴米油盐忙活，哪里顾得上什么精神？

可见物质基础很重要，经济增长很重要。并且，在一个经济全球化、全球市场化的时代，你想不关注增长都不行。比如，在一个远离市场化的群落，这里的人们过着简单朴素的生活。他们的价值取向可能完全是精神的。但是市场的边界在扩大，市场在侵蚀这片土地，于是，有一部分人开始了市场化，人们有了比较，原有价值标准开始分裂。市场化之下，哪里有净土？这里绝不是说市场化不好（这完全取决于大家的价值标准），更



不是说市场化导致了价值追求的堕落,只是强调,经济市场化也好,经济全球化也好,正在将多元价值标准转变成一元价值标准:那就是经济增长或发展胜过一切。一个群落如此,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甚至一个文明也是如此。在存在着全球竞争压力的情况下,唯有增长,唯有强大,才可能避免被边缘化的命运。经济力量在统一全球的价值观;无情的经济逻辑在驱动着世界发展的进程。

“唯经济增长”确实带来太多的负面影响。不过,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不能超越增长,因为增长是民生幸福的必要条件,并且增长还能带来很多积极的道德后果。哈佛大学教授本·弗里德曼在其大作《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中文版刚推出)中指出,我们所期望的自由、民主、宽容等高尚的道德,正是经由增长才能带来。我们应该继续为经济和财富的增长而奋斗。因为追求在财富上超越我们的父辈,这一过程在道德方面的好处如同物质方面一样多。比如,这会对社会上层产生一种财富效应。凯恩斯说,某人对其银行账户采取“暴政”,远比他对邻居这么干要好。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也指出,伦敦的财富增长当年是怎样地吸引了英国贵族,使他们放弃了其领地上的军队和彼此间的战争,而一心在伦敦社交界和宫廷占有一席之地。一个正在迅速富裕起来的社会,其上层会将精力集中于获取财富,即对物、对自然的权力,而不是对人的权力。弗里德曼总结道,如果你想要得到各种非经济方面的好处,比如机会的开放、宽容、社会稳定、公平、民主等等,经济的快速增长能让你远为轻易地达到目标。

不过,即便我们认同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也还要进一步追问一下:什么是经济增长?难道就是GDP数字吗?事实上,用于衡量增长的GDP指标存在很多缺陷,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缺陷就是GDP并不能真正地反映百姓的福利水平。比如,由于公共交通太糟糕,美国人不得不买车,车辆的价值被计入美国的GDP;但欧洲的公交系统很发达且不是以它们对乘客的价值来计算,而是被算做了政府的成本。此外,美国将两百万人关在监狱里,建造监狱的成本和狱警的薪酬也被计入GDP;而这些投入到家庭及企业安全方面的资本与劳动,在欧洲就没有那么必要。还有,美国相对于欧洲更极端的气候——更寒冷的冬天(除了佛罗里达和加利福尼亚)和更炎热的夏天(除了华盛顿、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必然使取暖和制冷的支出增加,这也会增加GDP。如果仅仅从GDP角度,那么美国要比西欧强很多。但如果从福利角度看,结果会很不同。西欧人的工作量比美国人少25%,可他们的社会福利水平却只比美国人低约15%,并且他们的收入分配更平等、贫困率也更低。

正因为 GDP 在衡量经济绩效与社会进步方面的局限性，法国总统萨科奇就邀请了一批国际知名学者(其中以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阿马蒂亚·森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为首，包括阿罗、赫克曼等大腕在内的 24 名顶尖经济学家)成立了“经济绩效与社会进步测算委员会”(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并于 2009 年 9 月出版了一份关于 GDP 的报告。这份报告详细总结了 GDP 在衡量人们生活质量与社会福利方面的缺陷并讨论如何改进 GDP 指标。这份近 300 页的报告可以看做是主流经济学在反思 GDP 指标方面所迈出的重要一步。

三、当经济学不再时髦

回到前面的分析，唯增长也好，唯 GDP 也好，唯经济学也好，其实都是非常片面的。这个世界是个多面体，经济这一面尽管很耀眼，但也只是一面。当大家(包括个人、团体以至国家)都在追求增长、报酬、物质利益的时候，当这些完全能以金钱衡量的事物成为人们行为目标的时候，经济学的分析当然就最为管用了。而一旦经济目标成为这个世界的核心目标，其他的一切，便都是这个目标的派生物了。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帝国主义”可以盛行的原因。因为，无论你有什么超越经济、超越物质利益之上的目标，经济学总是可以将这些转化成经济目标，甚至荣誉、利他、爱恨情仇都可以货币化。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异化。记得很多年前看过一本书，叫《单面人》(也译作《单向度的人》，作者马尔库塞)。今天的世界，不正在由一个多彩的世界变成一个单面的、纯经济的世界么？

当然，世界的异化并不能算是经济学的错，经济学不过是在解释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着什么。然而，世界潮流是会变的。古希腊时代，哲学统治一切；在中国的唐朝，写诗作文的水平最为人看重；而至少在工业革命之前，整个世界还显得那么“纯真”，并不懂得经济至上的意义。今天还在指点江山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再往后会怎样？我很欣赏凯恩斯在他的《劝说集》中所说的话——“当财富积累不是具有很高的社会重要性时，道德准则将有巨大改革。我们将能够摒弃许多假道德准则，它们已经压迫了我们 200 年。”

如果说经济学的兴起与繁荣和财富积累的社会重要性密切相关，那么在财富积累、经济增长变得不那么重要的时候，经济学恐怕也就不再是显学了。我很愿意相信，当经济学不再时髦的时候，也将是人类发展到更高阶段的时候。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都是 GDP 惹的祸

◇胡怀国

引子：大家都很忙！

每个人都很忙，美联储忙着救火，奥巴马忙着打嘴仗，格里姆松（冰岛总统）在琢磨着怎么赖账。我们这边更是风风火火，到处都在建 300 米以上的高楼，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沈阳、重庆、昆明等等，就连村里也开建了（华西村在建的 328 米高楼，据说是全国第 8 高、世界第 15 高）。

近来回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网站（ie.cass.cn），发现这里还有不少静下心来想事的人，譬如张晓晶研究员的《当经济学不再时髦》、韩朝华研究员的《“不讲道德”的经济学》，等等。是的，虽说斯密“看不见的手”，推着我们“紧张而又盲目地”追赶着，但有时候也该喘息一下，看看脚下的路。

我们为什么这么忙？这么累？是我们自己有问题，还是这个社会有问题？譬如过度追求经济增长和 GDP。抑或经济学家有问题？多年来，对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或 GDP 的批评，不绝于耳，各类颇具讽刺意味的笑话，在网上广为流传，包括挖苦和揶揄经济学家的各种版本。平心而论，我也一直对 GDP 存有疑虑。不过，当我开始认真琢磨这些问题时，却发现并非最初所想的那么简单。

当然，茶座并不是谈论如何核算 GDP 等技术性问题的地方，也不是谈论发展模式之类大理论的场所。认真琢磨了一下，最后决定，这篇小文应该老老实实在谈三个问题：（1）经济增长了，GDP 上去了，为什么这么多人感觉很辛苦？为什么惹来这么多人质疑？（2）尽管有质疑，并且是长期以来的质疑，为何现实社会仍是这个样子？（3）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经济学家的角色究竟是什么？

究竟是谁的问题？

不久前，在网上看到一个故事：一位博士买了房，入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坐在地板上放声痛哭，为自己、为父母、为拂袖而去的恋人、为自己牵肠挂肚的社会。这是一个个案，但相信在年轻人中带有某种普遍性。是啊，虽说收入一年比一年高，但压力似乎一年比一年大，我们到底在折腾什么？相信每个人都深有体会，尤其是那些毕业不久的

“天之骄子”。读书欠下父母扯不断的情,毕业了,挣钱了,为了小小的“蜗居”,居然要背上几十万的债,甚至成为“啃老”一族。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是自己有问题?是发展模式有问题(譬如净追求GDP)?还是经济学家有问题(譬如净拿数糊弄人)?困惑也好,质疑也罢,说白了就是整不明白。俗话说:“不是我不明白,是世界变化快。”这句话,还真说到点子上了。我们之所以觉得这么辛苦、这么累,很大的一个原因是:这世界变化太快!用经济学家的语言说:快速的变化,会放大各变量的二阶矩,一阶矩的预期亦因不确定性的增加而变得困难。老百姓不懂经济学术语,但可以比啊,同别人比,同自己的过去比。一比,问题就来了:是啊,经济发展了,收入提高了,但怎么就那么累啊!为了一套房子,几乎要押上自己的一生!

中国的快速变化,表现在方方面面,但最主要的是快速的市场化(广义)和迅速的“泛经济化”。不论你是否愿意,人生越来越多的方面,被迅速投入到市场竞争之中,并对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产生巨大的冲击,对每个人的生存状态和人生态度产生不可逆转的影响。在短时间内发生的这些迅速变化,自然令各类问题扑面而来!

对于我们,这是一个新问题。不过,放眼各国历史,却也算得上一个老问题:这几年折腾我们的那些事,外面早折腾几百年了。阿兰·德波顿曾经提及:“新的经济自由使数亿中国人过上了富裕的生活。然而,在繁荣的经济大潮中,一个已经困扰西方世界长达数世纪的问题也东渡到了中国:那就是身份的焦虑。”(《身份的焦虑》中文版序言,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

现代经济学体系的奠基者亚当·斯密,曾同我们一样追问过:“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辛苦和劳碌是为了什么呢?贪婪和野心,追求财富、权力和优越地位的目的又是什么呢?”(《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0页)“是为了提供生活上的必需品吗?那么,最低级劳动者的工资就可以提供它们”(同上)。确实,如果仅仅是吃点、穿点等生存所需之物质财富,我们蹲在树上的时候就已经解决了,那些鸟啊、鱼啊,不是自由自在的吗?何苦受现在这样的苦!

正如后文所述,以经济增长为主导、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现代社会,似乎能够为每个人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从而同样的成功机会(至少理论上如此),但由此也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和焦虑。因为,竞争机会的平等,彻底撕去了传统社会赋予贫穷的道德光环;人性中顽固的“认知失调”(扭曲信息以确认自己正确、成功,参见阿克洛夫《一位经济理论家讲述的故事》第7章),及其在信息爆炸时代的急速放大(在更大范围内寻找成功者,



并通过扭曲信息来证明自己本应更成功)等等,让这种压力、焦虑从而辛苦愈发膨胀。

这是每个发达国家的民众都曾遇到并继续深陷其中的问题。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曾比较了安逸的法国和富足的美国:前者自杀率高,后者精神病多。现在好像也一样:在中国农村,据说打架闹事等邻里纠纷,多发生在丰收后的农闲时节;在中国香港,经常会遇到莫名其妙的事情,譬如公交车上露体,辩称称工作压力太大(我一直也没弄明白其中的逻辑)。

虽然这是所有追求经济发展的国家普遍遇到的问题,但我们的变化太快,不仅工作生活方式的适应需要时间、心理调整需要时间,就是社会保障、住房医疗、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的完善亦需要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还是多调整自己来得实在,总不能一直这么苦着。套用中原地产老板施永青常说的活,“改变自己,总比改变社会来得容易。”

为什么替 GDP 辩护之一:斯密告诉我,方法很重要!

正如上文所说,现代社会的压力与焦虑,国内外没有什么不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说,这是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恶果,那么,为什么人家能够忍这么多年?不仅如此,人家美国,奉行实用主义,一个劲地追逐财富,在精神领域不仅不觉得矮人一等,甚至具有向全球推广“普世价值观”的自信。要不是在伊拉克、阿富汗碰了一鼻子灰,尾巴不知要翘到哪里去!

GDP,尽量客观、简单地记录现实经济活动而已,它本身并没有什么。如果质疑,我们应该直接质疑:为何要这么玩命地追求经济增长?在这个问题上,我也有困惑。不过,既然那么多国家乐此不疲,就一定有他们的理由。还是得从现代经济学的源头——亚当·斯密谈起!

虽然马克思说斯密“糊涂”,熊彼特说他“肤浅”,但他毕竟是人类社会第一个科班出身、受过专业训练的经济学家,人家毕竟是牛津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又是古希腊古罗马学术的嫡传弟子(大致沿如下路线:苏阿勒斯——格劳秀斯——普芬道夫——卡迈克尔——哈奇逊)。斯密之前的那些经济学家(其后不少也是),要么是奸商,要么是投机取巧的官员,没有一个是科班出身、毕生搞研究的。

斯密的经济学体系,能够历经古典、新古典,迄今仍具深远影响力,同他的方法有关。斯密的方法,实质上就是找一根简单的绳子,把繁杂世界穿起来;绳子之外的东西,能模糊就模糊,能迁就就迁就。对于斯密的迁就和模糊,马克思惋惜不已:“斯密啊斯密,哥们好人啊,但太糊涂;李嘉图刚理出个头绪,却被麦克库洛赫给卖了!这个大骗

子,纯粹为了发财……”

马克思的批评,恰中要害,但他确实误解了斯密。斯密不是糊涂,是装糊涂;马克思不糊涂,但却把几百年来无数学者弄糊涂了!马克思是大思想家,是想大事的人,凡事必得弄个水落石出。可现实世界中,误差项或随机干扰项太多了、太杂了,尤其是“卢卡斯批判”之类的,每个人都活蹦乱跳、古灵精怪的,自我实现的预期或动态不一致,随时把整个世界搅得天昏地暗。

为什么替 GDP 辩护之二: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按照斯密的方法,任何解释现实的东西,要有一根简单的绳子,其他能模糊就模糊!同样,任何在现实社会生存的个人,脑子里也要有一根简单的绳子,其他能模糊就模糊!还是同样,任何现实社会,要能够一起做成一些事(当然,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也需要一根简单的绳子,其他能模糊就模糊!

当年,苏格兰启蒙运动学者在一起聊宗教问题,称“一神论为宗教,多神论为迷信”,而没有信仰的地方则是未受到文明熏陶的“蛮族”。上学的时候,看到这些,颇不以为然,觉得我所尊重的这些大学者,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随着工作生活阅历的增加,我渐渐理解了他们的想法:或许概念的具体含义有别,但他们强调或寻找的,是联结现代社会的那根“绳子”——越简单清晰越好的绳子。

追求经济增长甚或 GDP,有万千不是,但至少有一条是对的:它也是联结现代社会生活的一根绳子,并且是最相对公平的绳子(市场,价格,等价交换)。同其他绳子相比,它能够被绝大多数人接受,能够为每个人提供相对平等的机会!法律似乎也可以,但由于法律是“压”,经济为“引”,动力有差别;且法律作为社会习俗的制度化,很多东西不明确(否则也不需要律师了),不如经济简洁,可自我运行(譬如经济可全球化,法律就不能)。道德就更差了,譬如关于“子贡赎人”、“子路受牛”的故事,孔子曰:“子路受而劝德,子贡让而止善”。

经济这个“绳子”,最简单明了、最易为绝大多数人接受,故而,若一个社会以它作为“绳子”,其他能模糊就模糊,那么经济发展一定快。绳子多了,事情往往就比较麻烦。前几年到缅甸,“绳子”多得眼花缭乱:据当地朋友介绍,缅甸人院子里的晾衣绳有两根,高的晾晒男士衣物,低的晾晒女士衣物,绝不可以混用!越穷越讲究,越穷越折腾,N 种标准让人无所适从!在这种情况下,若能将经济搞起来,那才是咄咄怪事!当然,经济这根“绳子”,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现实世界不存在“最好”,唯争取“绳子”之外的东



西不断完善,努力做到整体“更好”;而这根“绳子”本身,却是断然不可丢弃的。

法国也有个启蒙运动,说得动听,但方法有问题,害得法国栽过大跟头。法国大革命的时候,“绳子”太多、变得太快,政治的、道德的、经济的,相互扯在一起,再加上在思想上追求彻底、不妥协、不含糊,在卢梭“肉体消灭人民公敌”的思想武装下,把法国科学家杀了个底朝天。罗兰夫人更是在断头台上发出了响彻世界的呐喊:“自由啊!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天外有天:经济学只是一小块

知识分子追求的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只要涉及民众福祉,可无所不谈。不过,具体到不同学科,则显然有分工,有相应的研究领域和适宜的分析工具。按照亚当·斯密的分法,现代社会中最为重要的三大社科领域分别是:法律政治、经济和道德,它们分别研究正义、谨慎和仁慈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谨慎(或经济)是每个人生存的基础,正义(政治法律)是社会这座大厦的支柱,仁慈(伦理道德文化)则是调味品”。也就是说,仁慈是调味品,人类因它而美好,但没有它,日子也得过;但经济和正义不同,经济是个人生存的基础,正义是社会存在的基础,没有它们就玩完了。

顾名思义,经济学家的本职工作应该是“经济”或“谨慎”。至于正义、仁慈,那不是经济学家的本职工作。正义不正义、道德不道德,是民众的事、是政治家们的事,而政治家的行为至少在理论上取决于民众。经济学家不讲道德,不存在应不应该的问题,分工而已;斯密不是说了吗,分工才有效率呢!

当然,“经济”这根绳子,把大家拴在一起,“平均每个人”就有钱,经济就繁荣,但不是“每个人”都有钱,每个人都感觉好,在道德上就怎么怎么样。斯密说得好,大厦倾否,取决于“正义”;幸福快乐否,取决于“仁慈”。现在的许多问题,表面看起来主要是经济问题,但其实不完全是,因为“谨慎”、“正义”和“仁慈”本来就是相互影响的。

至于GDP指标本身,也不是不能改进,但总感觉得不偿失。一些经济活动,或许不应该纳入GDP核算,但它毕竟需要生产要素投入,而经济体系本来就是相互联系、“牵一发而动全身”,反而不如通过财政货币政策、行政法规等来得直接。作为记录经济活动的指标,GDP的核算越简单越好,但它现在已经够复杂;当然,统计部门也可以增聘人手,还可兼收增加就业和创造GDP的好处,但这已经有违初衷了。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制度演变：路径依赖 or 路径创造？

◇韩朝华

近读文献，沉浸于有关制度演变路径依赖说的争论之中，颇觉有趣。现择其要点，与学界同仁共享。

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概念源于技术工程领域，但从道格拉斯·诺斯等人将其引入经济制度演变分析后，便迅速走红，至今已扩散至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史学等领域，成了当代社会科学在制度分析上的重要工具。

不同学派对路径依赖有不同的诠释，但其最普适、最一般的含义是说，在一个时间上依次发生的事件序列中，发生于较早时点上的事件对发生于较晚时点上的事件具有决定性影响，从而先前时点上的偶然事件往往能决定整个事件系列的演变轨迹和基本特征。由此也产生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历史至关重要。”

制度演变中的路径依赖性一旦得到广泛认可，在经济发展和制度研究领域流行的各种“趋同论”(convergence)便开始受到挑战。

例如，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经济增长水平或增长速度趋同论认为，因要素边际收益率递减律的作用，较发达经济体的整体增长速度将趋于减慢，而不发达经济体则会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因而经过一定时间后，落后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在增长水平上的差距将趋于收敛。但在经验研究中，这一假说未得到具有普遍性的证明。且世界上发达经济体与不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差距也未见普遍缩小，反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没能为普遍的、必然的增长水平趋同说提供足够的证据。

而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演变路径依赖说则对此现象提供了理论解释。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社会制度的设置和安排是否有助于经济增长，对一个经济体能否实现经济持续增长至关重要。而那些发展水平相对低下的经济体所以长期落后，往往是因其制度体系中存在着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且长期难以克服。道格拉斯·诺斯在199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讲中就提到，因各国初始条件不同，发展速度各异，一般说来，欠发达国家很难赶上发达国家。

关于经济体制趋同与否的争论也很热闹。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指出，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济体制已呈现出“混合经济”的特征，因而不同制度体系中的经济体正在体制上趋同。但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引发了对各国制度特殊性和多样性的关注。



人们发现,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明显而持久的制度差异,即使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同样存在着多方面的体制差异,现实中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有着明显的国别特征。为此,相关文献中还出现了“资本主义多样性”(the varieties of capitalism)的说法。

在企业制度领域,围绕趋同假说的讨论一样引人入胜。如《公司治理:趋同与存续》(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中译本)就展现了法学家们围绕各国公司治理模式是否趋同的意见交锋。该书第一章开宗明义,以“公司法历史的终结”为题,论证各国的公司治理制度将收敛于以股东利益为中心的模式。导致一些学者得出这类结论的主要根据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竞争将迫使各国企业采用最具效率优势的制度,做不到这一点的企业将在竞争中出局。但更多的研究者对此存疑。如哈佛法学院的 David Charny 教授认为,市场竞争过程及其后果并非单调、线性地指向效率的不断提高,实际生活中,有许多因素会使竞争的后果变得不确定。即使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家仍可能长期维持低效率制度。哥伦比亚法学院的 Curtis J. Milhaupt 教授也认为,尽管经济全球化可能促使各国企业选择高效率的公司治理模式,但公司治理结构的形成是一种政治性过程。在不同国家里,不同利益集团对公司制度的政治影响力相差很大,因而各国政治决策系统对公司治理模式的选择会各有侧重,世界上的公司治理制度很难趋同。

总的来看,制度演变的路径依赖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制度多样性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无视路径依赖性的、缺乏历史惯性视角的制度分析已不再具有理论影响力。

关于制度演变过程所以具有路径依赖性的原因,一般认为有四方面的因素,即“递增回报”、“自我增强”、“正反馈”和“锁定”。“递增回报”是指某种行为或选择被采用得越多,它所能带来的益处就越大;“自我增强”是指某种行为或选择本身会带出一批与其互补并增强其作用的行为或因素,而这又会进一步延续和强化该种行为或选择;“正反馈”是指某种行为或选择的后果会使更多的主体更多地接受这种行为或选择;至于“锁定”则主要是指某种行为或选择一旦被采用,再要想转换为其他行为或选择,将面临高昂的代价。

但问题并未就此完结。路径依赖说的兴起也给制度演变分析带来了新的理论挑战。澳大利亚政治学家 Ian Greener 在《政治学》2005年2月号上撰文批评说:“如果历史很重要,那么变革怎么会发生?人类社会怎么打破历史惯性?”美国学者 Marc Schneiberg 在2007年的一篇论文中也指出,路径依赖论在方法上面临着两难选择:如果路径依赖是制度演变中的主要决定因素,制度轨迹的根本转变如何可能?但如果肯定制度轨迹会发生

根本转变,则路径依赖说的理论重要性就要大打折扣。

这的确点到了路径依赖概念的一大缺陷,即路径依赖说只强调初始条件或早期因素对后续制度轨迹的决定性影响,因而带有过强的历史决定论倾向。机械地诉诸路径依赖说,无法解释重大的制度转变和新路径的产生。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制度及其演变轨迹的根本转变并不罕见。尤其是,在90年代的极短时间里,东中欧一批国家的基本社会制度便从社会主义模式激变为资本主义模式,似乎很难仅靠路径依赖说来圆满解释。

这样的问题意识推动着研究者们超越单纯历史视角,关注起路径转换(path changing)和路径创造(path generation)来,由此也产生了一批新颖的制度演变解说。2005年,德国学者 Bernhard Ebbinghaus 在一篇题为“路径依赖能解释制度变迁吗?”的论文中认为,“过去塑造未来”(the past shapes the future)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踩踏路径’(trodden path)方式,另一种是‘分岔路径’(branching pathways)方式。前一类路径的形成毫无计划,是某种行为在大量个体中自发扩散和重复的结果;而后一类路径的形成要依赖行为主体在关键时点从若干不同可用路径中做出的选择。Bernhard Ebbinghaus 认为,基于第一种路径形成说的分析,决定论倾向过强,无法解释复杂的制度变迁;基于第二种路径形成说的分析,相当灵活,适于分析各种形式的制度演变。美国著名政治学家 Paul Pierson 的阐述更形象。他认为,所谓路径依赖,如同爬树,上树者在攀缘过程中会遇到许多不同的枝干;他虽然可以从一个枝干转到另一个枝干上去,但这样做的代价很高。因而一般情况下,上树者会沿着其一开始选择的那个枝干顺势攀缘,并不轻易转换枝干。

可以看出,这样的路径转换说并不否定先前的路径选择对后续路径的重要影响,但它将行为主体在制度演变或制度形成过程中的选择活动纳入了理论框架。在这样的分析框架中,制度演变轨迹不再仅仅受制于历史惯性,它同时也要受行为主体理性选择的影响。由此而来,机械的历史决定论得到克服,不确定性和多样性成为制度演变过程中符合理论逻辑的必然特征。即使已经稳固下来的制度体系或制度路径,也完全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发生难以预料的重大转变。

而美国社会学家 Marc Schneiberg 发表于2007年的一篇论文则提出了一种更独特的制度演变假说。他认为,一个社会的制度体系和制度路径中,除了占据主导地位的制度体系和路径外,还会混杂着各种异质的另类制度碎片或元素。这些非主流的制度碎片或元素由历史上未赢得主导地位的制度模式或演变路径残留下来。它们对主流制度路径来讲毫无用处,但在一定的条件下,却有可能成为构建新制度或新路径的资源 and “建



筑砌块”。由于不同社会的历史不同,其制度系统中内含的另类制度碎片也就不同,从而不同社会在面临内外冲击时基于历史遗留物所做出的制度反应也会差异很大。因此, Marc Schneiberg 指出,这里显然存在着路径依赖性,但这种路径依赖性不是指延续和巩固既有的主导制度路径,而是指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另类制度元素或制度碎片,经过新条件下的某种复兴、重组或改造,形成取代既有主导制度的新制度。Marc Schneiberg 称这一制度演变理论为“关于制度变迁和新路径创立的‘构成型另类选项’说”(a “structured alternatives” perspective on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new path creation)。Marc Schneiberg 强调,基于这样的理论框架,制度变迁和新路径的形成可以出自多重动力和源泉,历史惯性、内生嬗变、外源冲击和制度移植等等,都可能左右制度演变的未来轨迹。

而 Marie-Laure Djelic 和 Sigrid Quack 发表于《理论与社会》2007 年 4 月号上的“克服路径依赖:开放系统中的路径创造”一文还进一步提出,各国的制度系统正日趋开放并相互影响,因而在研究制度变迁和路径创新时,应从开放系统的角度关注跨国制度框架内国别性路径转换与跨国性路径创新之间的共演化互动关系(co-evolutionary interaction between national path transformation and transnational path creation)。

可以看出,在这些新的制度演变分析框架中,历史仍然至关重要,但已不是唯一因素。这类制度变迁解释将行为主体的理性选择纳入了分析,从而有可能将制度演变过程当作一个政治过程来处理。这样的思维方式深刻地影响了对东中欧国家中制度转型机制的分析和阐释。如两位德国学者(Jürgen Beyer and Jan Wielgohs)在 2001 年的一篇文章(On the Limits of Path Dependency Approaches for Explaining Postsocialist Institution Building)中指出,东中欧各国在转型上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很相似,但它们采用的转型战略却相差很大,这说明各国政治领导层在改革中做出了不同的战略选择。但这种战略差异并不都源于意识形态立场或政治倾向,没有一个国家是完全靠“新自由主义”设计蓝图来导入市场经济制度的。在这些国家里,可供决策者挑选的制度选项或战略手段均上承各国的历史遗产——各国在社会主义时代和前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路径。因此,这些国家中的新制度建设并非制度真空中的独创,而是对多种既有制度元素的拼凑、改造和重组。它们更类似于某种适应性调整,而不是建筑学意义上的新建。就此而言,东中欧各国的制度转型体现了路径依赖性,但这种路径依赖并不表现为原制度路径的延续,而表现为历史上的制度遗产对新制度建设或新路径选择所施加的制约。而新的制度路径一旦成形,可供制度选择的政治“窗口期”就随之(下接 22 页)